

第一章 陪审

导语

春天来了，春草开始死而复生，而我们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却要走上审判庭，为一起冤案而接受审判。我们的男主人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这位与玛丝洛娃有过缘分的公爵，却是审判员。他看见她，会怎么想？而她还能认出他吗？

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稠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苍蝇让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唯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硬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

因此，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那上面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须把三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遵照那个指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脸容疲惫，鬈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拦腰系一根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玛丝洛娃吧？”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



跟前。

看守长哗啷一响开了铁锁，拉开牢门，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臭的空气冲出来。他吆喝一声：

“玛丝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关上牢门，等着。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并很快转过身，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这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这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宽的手和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眼睑稍稍有点水肿，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都一律照办。玛丝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各处牢门上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盯紧他们。他们走进办公室里，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兵，指着女犯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院墙以外，然后顺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文官纷纷停住脚，好奇地打量着女犯。

女犯感到众人的目光向她这边射过来，就没有扭转头，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的春天的空气，同监狱里相比，清爽多了。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女犯的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扑拉拉飞起来，扇动着翅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风。女犯微微一笑，想起她的境况，沉重地叹一口气。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是未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这个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乡下，母亲为一对地主老处女姐妹做工。未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孩子，并且按农村的惯常做法，给婴儿行洗礼，然后母亲不给婴儿喂奶，于是这个不该出生的、妨碍干活的、多余的婴孩很快也就饿死了。

这样已经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受过洗礼，都不给喂奶，统统都是饿

死。第六个孩子是她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本来婴儿的命运也会同前五个孩子一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偶然来到牲口棚，斥责女饲养工，说奶油有牛骚气。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婴儿躺在牲口棚里。老处女说完奶油的事，又责备不该让产妇进牲口棚。她正打算离开，突然看到婴儿，忽发慈悲之心，自愿做这个婴儿的教母。她为女婴行了洗礼，后来因为可怜自己的教女，常常送点牛奶和钱给她的母亲，女孩就这样活下来了。老处女两姐妹为此叫她“得救女”。

女孩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口的老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便把她领去抚养。很快黑眼睛的小姑娘出落得非常活泼可爱，常常使两个老姑娘觉得快慰。

两个老姑娘中的妹妹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正是她给小姑娘行了洗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则较为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给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可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女孩应该干活，成为贴身使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情绪不佳就罚她，甚至还打她。小姑娘在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影响下，长大后成了半是使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是不俗不雅的，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富裕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尽管她既不敢向他表示，也不敢对自己承认。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上战场前顺路拜访两个姑妈，在她们家住了四天。临走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卡秋莎断定自己怀孕了。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把卡秋莎赶了出去。从老姑娘家出来后，她到警察局长家当使女，可是只在那家待了三个月，便因粗暴无礼遭辞退。这时，她再找活儿已不合适，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她只好住到一个会接生兼贩酒的农村寡妇家。分娩很顺利，可当时接生婆为村里一个有病的产妇接过生，把产褥热传给了卡秋莎。生下来的婴儿是个男孩，被送到育婴堂，据送他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送到那里就死了。正当玛丝洛娃失去任何依靠，生活特别穷困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从此过起了违背上帝戒律和人类道德的长期的罪恶生活。千千万万妇女过的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利益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鼓励。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常常十有八九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白天沉沉昏睡。天天如此，整整持续一周。到了周末，她们就去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有政府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



时认真严格，有时候则失去了自然界为阻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也赋予动物的羞耻心，以调笑取乐的态度为她们检查身体，发给许可证，准许她们继续犯罪，就像她们与自己的同谋者上一周所干的。于是，照例又是一星期。就这样，无论春夏秋冬，不分平日假日，她们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在她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为此她进了监狱，在与杀人犯、盗贼同狱待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往法院受审。

当玛丝洛娃在两名士兵的押送下走了很长的路，筋疲力尽地来到法院大楼时，当年引诱她的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却仍然躺在他那高高的装有弹簧床垫的床上，上面还铺着羽毛褥垫。他穿着一件仔细熨过的质地良好、干净笔挺的亚麻布睡衣，吸着香烟，想着他今天必须要做和昨天发生过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是和柯察金一家一起度过的。这是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但是，除了像一般青春已过、又非陷入热恋中的男人通常表现出的对婚姻的犹豫外，聂赫留朵夫还有许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即便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也不能马上去求婚。这倒并非因为他在十年前诱奸了玛丝洛娃又把她抛弃了，他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而且即便想起来，他也不会把它看作不结婚的一个理由。绝不是因为此！真正的原因是他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他认为这种关系已经结束了，但那位女士却不这么认为。

聂赫留朵夫和女人在一起时很腼腆，而正是他的这种腼腆唤醒了这位有夫之妇想要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地区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平日就不太检点。她一步步将聂赫留朵夫引入这不正当的关系中，让他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同时却又一天比一天讨厌她。在屈服于诱惑之后，聂赫留朵夫觉得很内疚，以至于没有勇气在未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断绝这种关系。而这便是为什么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年轻的柯察金小姐求婚的原因。

“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

“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走廊上的人们已经在紧张地活动了。



“地方法庭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说。

“您找哪一个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员。”

“那就是找刑事庭。您应该说明白。从这儿往右走，再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按照他的指点走去。

法庭庭长今天早早来到法院。他高大而又肥胖，一大把络腮胡子已经变得花白。他虽有妻室，但是生活极其放荡，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今天早晨他接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信，信中说她今天下午三点至六点在本城的“意大利旅馆”等他。这个瑞士女人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现在从南方去彼得堡，途经本城。由于这个缘故，庭长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以便在六点以前能与这位火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会面。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与这个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咔嚓一声锁上房门，从文件柜的底层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侧、向下各做了二十个动作，然后高举哑铃，轻松地做了三个下蹲动作。

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法官走进屋，他个子不高，双肩耸起，脸上愁眉不展。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有来。”法官不满地说。

“还没来，”庭长边穿制服边说，“他总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会不害臊！”法官说，气呼呼地坐下来，掏出纸烟。

这个法官办事很死板，今天早晨他跟妻子闹了一场不愉快，因为妻子把要用一个月的钱提前统统花光了。她求他预支一点钱，可是他说他不能违例，结果大闹了一场。妻子说，既然这样，家里不做饭了，他别想回家吃饭。说到这里，她就走了。他害怕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瞧，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生活倒是这个下场，”他暗自思忖，眼睛望着面前这位容光焕发、身体健壮、快快活活、性情温和的庭长。此刻庭长大大地伸开两肘，用两只细嫩白净的手将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拨到绣花衣领两侧。“他永远心满意足，快快乐乐，可我总是受折磨。”

书记官走进屋，送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烟，“我们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就审投毒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嗯，好吧，投毒案就投毒案吧。”庭长说，他认为这个案子四点之前可以审结，之后就可以走了。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让我问您，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道。

“那当然，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个案子？”



“投毒案。”

“那很好。”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不认为这有什么好。他昨夜通宵未眠。他们为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玩纸牌一直玩到下半夜两点，然后坐马车到玛丝洛娃六个月前所待的那家妓院玩女人，因此恰恰没来得及阅读有关投毒案的卷宗，所以现在想粗粗浏览一遍。书记官明知道副检察官没有看过投毒案的卷宗，却故意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个案子。按思想方式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而副检察官布列韦是保守派，他像所有在俄国做官的德意志人一样，对东正教特别虔诚。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对他的职位又很羡慕。

陪审员们刚进来坐好，传达员就迈着他那往边上拐的步子走了进来，来到法庭前半部，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喊道：

“现在开庭！”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庭长翻阅了案卷，向警官和书记官问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吩咐带被告上堂。一会儿，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名戴军帽的宪兵手握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接着进来的是被告，先是一名满脸雀斑的红头发男子，然后是两名女子。进来的第三名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的男人眼睛一齐转向她，一双双眼睛很久都离不开她那白嫩的脸、那水灵灵的黑眼睛和囚袍底下那高高隆起的胸脯。就连一名宪兵，当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目送她走过去，坐下来，等她坐下了，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有失体统，赶紧转过脸来，提起精神，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

“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庭长说道，“对你的指控是，你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旅行皮箱钥匙从妓院跑到摩瑞塔尼旅馆，窃取了箱子里的一些现金和一枚戒指。”他说这一切时就像在背书一样，同时把身子倾向左边的法官，那个法官正凑向他的耳朵轻声告诉他物证清单中提到过的一个酒瓶不见了。“窃取了箱子里的一些现金和一枚戒指，”庭长重复了一遍，“随后分了赃。此后你又同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瑞塔尼旅馆，并在他的酒里下了毒，因而导致其死亡。你服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急地开始说道，“就像我原先说过的，我现在再说一遍，我没有拿过，我没有拿过，我什么也没有拿过，那枚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你不承认犯有偷窃两千六百卢布现金的罪行吗？”庭长问道。

“我已经说过，除了那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你承认犯了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酒里放毒粉的罪行吗？”

“是的，这事我承认。不过，那只是因为我相信了他们告诉我的话，说那是安眠药，吃了不会有任何事。我从来没想到过，也从来没有想过……上帝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她说道。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偷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金和戒指的罪行，但是承认给他喝过毒酒？”庭长说道。

“嗯，是的，我承认是有这么做过，但是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只是想让他睡着，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想到过会更糟。”

“很好，”庭长对取得的结果显然很满意，“现在告诉我们整个事情的经过，”说着他往椅子上一靠，把两只十指交错的手往桌上一摊。“从头到尾说一说。坦白招供将作为从宽发落你的有利条件。”

玛丝洛娃一直盯着庭长，一言不发。

“你没有什么别的要说了吗？”

“我已经全部都说了。”玛丝洛娃叹口气说道，坐下来。

随后庭长记了点什么，在听了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的话后，宣布休庭十分钟，然后匆匆站起身，离开了法庭。他和左边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生有一双善良大眼睛的法官交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感到胃里有点不舒服，想按摩一下，吃点药水。而这便是审讯中止的原因。

在法官们起身之后，律师、陪审员和证人们也纷纷起身，大家都高兴地感到整个案件已审完了一部分，开始四散走动。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感悟·思考

1. 玛丝洛娃身世如何？是什么原因让她卖身到了妓院？

2. 你觉得玛丝洛娃有罪吗？为什么？

第二章 往事

导语

往事对每一个人来说既有甜蜜也有辛酸。聂赫留朵夫在姑姑家第一次见到卡秋莎，便被她吸引了，而她会爱上他吗？他离开姑姑家，去了军队，从军队回来后的他变得与以前有什么不同了？他对卡秋莎的感情还像以前刚认识时一样浓烈吗？而卡秋莎又怎么想？

是的，法庭上的玛斯洛娃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上大学三年级那一年。那时候他为了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在姑妈家里过了一个夏天。往年一到夏天他总是跟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莫斯科附近他母亲的大庄园里。但那一年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度夏。姑妈家远离城市，十分清静，受不到干扰，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那种古老而朴素的生活。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精神振奋，意气昂扬。一个青年人，一旦不是按照别人的指点，而是自己领会到生活的美好和重要性，领会到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担负的事业的全部意义，看到人本身和全世界都有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而且不但满怀希望，并且怀着能够实现自己的完美理想的充分信心去实现这种完美理想的时候，都会是这样的。那一年他在大学里就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断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父亲并不富有，母亲却有一万俄亩左右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真正残酷和不平，而他又是一个十分看重道德的人，认为为了合乎道德要求而作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他决定不再享受土地所有权，立即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交给农民。他正是就这个

问题在写一篇论文。

那一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很早就起身，有时才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出山，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还披着蒙蒙的晨雾。等他洗完澡回来，花草上还闪烁着露珠儿。早晨他喝完咖啡，有时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上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之前，他在花园里找个地方睡一觉，然后在吃午饭时候凭他那股快活劲儿逗得两位姑妈也快快活活，笑声不断。饭后他就骑马或者划船，晚上又看书，或者陪两位姑妈坐坐，摆摆纸牌算卦。夜里，特别是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他常常不能入睡，原因只是他感受到的生活中的喜悦太大，太激荡人心了，于是他干脆不睡觉，怀着一个个美梦、一样样打算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有时一直到天亮。

他在姑妈家的第一个月就是这样幸福而宁静地度过的，根本没有留意那个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眼睛乌黑、脚步轻盈的卡秋莎。

当时聂赫留朵夫才十九岁。他一直在母亲的羽翼下成长，是一个十分纯洁的青年。他梦想有一个女人，只是梦想有一个妻子。凡是他认为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对他来说都不是女人，只是人。可是，事有偶然，在那年夏天的升天节，姑妈家有位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玩，其中有两位小姐、一名男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女邻居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就到门前已经割过草的草地上玩起捉人游戏。他们把卡秋莎也带去了。玩过几回之后，便轮到聂赫留朵夫跟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是很愉快，可是他从来没想到，在他与她之间会发生什么特别的关系。

“哈，一下子别想捉住这两个人，”轮到捉人的快活的画家说着，迈动他那庄稼汉的短而壮的罗圈腿飞跑起来，“除非他们自己绊一跤。”

“您呀，休想逮住我们！”

“一，二，三！”

他们拍手拍了三下。卡秋莎勉强憋住笑，敏捷地和聂赫留朵夫交换了位子，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便朝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让画家逮到，就使足了劲儿跑起来。他回头看了看，看到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飞快地迈动着年轻而矫健的两条腿，渐渐撇开他，朝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谁也没有跑到那后面去过，但卡秋莎回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点头示意，要他到花坛后面会合。他领会她



的意思，就朝花坛后面跑去。谁知丁香花丛后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踩空，跌进沟里，双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夕露。但他一面自己笑着自己，一面很快地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地方。

卡秋莎闪动着带露醋栗似的亮晶晶的乌黑的眼睛，笑盈盈地迎着聂赫留朵夫飞跑过来。他们会合了，紧紧握手，表示胜利。

“我看，您准是刺破手了。”她一面用空着的那只手理着松开的辫子，一面呼哧呼哧喘着气，微微笑着，从下朝上对直地看着他说。

“我不知道这儿有一道沟。”他说，也微微笑着，没有松开她的手。

她向他靠了靠，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把脸朝她凑过去。她没有躲闪，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吻了吻她的嘴唇。

“这算什么呀！”卡秋莎说着，急忙抽出手来，跑开了。

她跑到丁香花前，折下两枝开始凋谢的白丁香，拿丁香花枝儿拍打着自己那热辣辣的脸，不住地回头朝他望着，很带劲儿地在面前摆动着两臂，转身朝做游戏的一些人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变成了相互爱慕的纯洁少年与纯洁少女之间的特殊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里来，或者甚至聂赫留朵夫老远看到她的白围裙，他就觉得似乎一切都被阳光照亮了，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悦目，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快乐。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不仅卡秋莎在跟前能对他产生这样的作用，只要一想到有一个卡秋莎，也会对他造成同样的影响。对她来说，只要一想到有一个聂赫留朵夫，都会产生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有时收到不愉快的母亲来信，或者有时论文写得不顺手，或者有时心头涌起少年人那种莫名的惆怅，但只要一想到有一个卡秋莎，而且他可以看到她，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卡秋莎在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她能够把一样样事情都做好，还能抽空读书。聂赫留朵夫就把自己刚刚读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拿给她看。她最喜欢屠格涅夫的《僻静的角落》。他们俩偶尔相遇就谈上几句话，例如在过道上，在露台上，在院子里，有的时候还在姑娘们的女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间里，因为卡秋莎跟女仆同住一处，聂赫留朵夫偶尔到她们的小屋里去啃着糖块喝茶。有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在场，他们谈起话来最畅快。如果只有他俩在一块儿，谈话却别扭得多。他们的眼睛立刻开始讲些跟他们嘴里所讲的完全不同而且重要得多的话，他们的嘴唇绷紧，心里害怕，就连忙分手了。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他和卡秋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位姑妈发现这种关系，有点害怕，甚至往国外写信把这事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娅姑妈很怕侄儿跟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这种害怕是多余的，因为纯洁的人最是多情，聂赫留朵夫正是不自觉地爱上了卡秋莎，也正是这种爱情保证他和她不致沉沦。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会和她发生这种关系就害怕。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娅姑妈的担心倒是切实得多。她担心性格倔犟而果断的侄儿一旦爱上这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犹豫地同她结婚。

假如聂赫留朵夫当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假如当时有人劝他绝对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他就会凭他那敢做敢当的性格做出决定，认为只要他爱上一个姑娘，就不管她是什么人，没有理由不同她结婚。可是，两位姑妈没有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他，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这个姑娘，他就这样走了。

他当时满心以为，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当时充溢于他全身的生活的欢乐感的一种表现，这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姑娘在和他同享这种生活的欢乐感。可是，在他动身的时候，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泪汪汪的有点儿斜视的黑眼睛送着他，他才感到，他别离的是一种美好的、珍贵的、一去永不返的东西。他觉得无限惆怅。

“再见，卡秋莎，各方面都得感谢你！”他一面登上马车，一面隔着索菲娅姑妈的睡帽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过这话，便强忍着满眶的眼泪，朝门廊里跑去，到那儿她可以痛痛快快哭一场。

从那时候起，聂赫留朵夫一连三年没有跟卡秋莎见面。一直到他刚提升为军官，动身到军队去，顺路到姑姑们家里去一趟的时候。不过这时候，他跟三年前的夏天在她们家里住过的那个人相比，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了。

原先，他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却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原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一个秘密，他带着快活的热情极力要解开这个秘密。如今，这个世界的生活里的一切都简单明了，已经由他所过的生活的各种条件规定清楚。原先，同大自然的交接，同在他以前生活过、思索过、感觉过的人（哲学和诗歌）的交接，才是重大而必要的；如今，重大而必要的却是各种人为的制度以及跟同伴们的交接。原先，女人显得神秘而迷人，是惟其神秘才迷人的生物；如今女人，除了他的家属和他朋友的妻子以外的一切女人，其功用是很明确的：女人



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的工具。原先，他不需要钱用，他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也用不完，他能够放弃他父亲名下的田产把它送给农民；可是现在，母亲每月给一千五百卢布，他还是不够用，常常为了钱跟母亲发生不愉快的交涉。原先，他认为他的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的自己；如今，他认为他那健康而活跃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了。

他所以会发生这种种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他所以会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生活下去就会过于困难：相信自己，就得亲自解决一切问题，而那种解决总是不利于他那追求轻松快乐的兽性的我，而且几乎总是同它抵触；而相信别人，那就任什么问题都不需要解决，一切问题早已解决好，而且那种解决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再者，他相信自己，就总是遭到人们的责难，而他相信别人，倒会博得他四周的人们的赞扬。

比方说，聂赫留朵夫思考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籍，议论这些问题，他四周的一切人就都认为这不合时宜，多少有点荒唐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姑就用好意的讽刺口气称呼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可是等到他看长篇小说，讲猥亵的故事，到法国剧院里去看滑稽的轻松喜剧，快活地讲戏里的情节，大家倒都称赞他，鼓励他。每逢他认为必须节减他的用度，穿陈旧的军大衣，不再喝酒，大家就认为这是脾气古怪，有点标新立异，可是临到他花一大笔钱置办猎具，或者布置一个与众不同的奢华书房，大家反而称赞他风雅，送给他种种贵重的物品。他本来保持着童贞，打算照这样保持到结婚的那天，他的亲属却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他母亲听说他成了真正的男人，从他的同事手里把一个法国女人夺过来，她甚至并不因此难过，反而高兴。这个身为公爵夫人的母亲每一想到他同卡秋莎的那个插曲，想到他居然有意跟她结婚，总不免心惊胆战。

同样，当初聂赫留朵夫达到成人的年龄以后，认为拥有土地是不公正的，因而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一块不大的田产送给农民，他这个举动却使得他的母亲和亲属大惊失色，从此这件事就成了他的一切亲戚不断责难和讥笑的对象。人们一再对他说，农民得到土地以后不但没有发家致富，反而开了三家酒店，索性不干农活，所以更穷了。可是等到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他那些门第高贵的同事们一起挥霍和赌博而花掉很多的钱，害得叶连娜·伊万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的时候，她倒几乎一点也不伤心，反而认为这是人之常情，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也未尝不是好事。

起初，聂赫留朵夫极力硬顶，然而这种硬顶过于艰苦，因为凡是他在相信



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好的事情，别人却都认为是坏的；反之，凡是他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坏的事情，他四周的一切人倒都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他这样否定自己，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是不愉快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没有保持很久。这段时期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和喝酒，很快就不再体验到那种不愉快的心情，甚至感到颇为轻松了。

聂赫留朵夫凭他那热烈的性格，彻头彻尾地投身于他四周的一切人所同声赞扬的这种新生活，全然扑灭了他内心别有所求的呼声。这个变化是在他搬到彼得堡去以后开始的，到他在军队中工作的时候就大功告成了。

军人的职务本来就驱使人堕落，它把进入军队的人安置在完全闲散的条件下，也就是免去合理而有益的劳动，替他们解除了人所共有的义务，而用来代替这些义务的却无非是传统的军队荣誉、军服荣誉、军旗荣誉等等。军人的职务一方面使得担任军职的人处在对其他人享有无限权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迫使他们在高于他们的长官面前保持奴颜婢膝的驯顺态度。

然而，除了军人的职务以及军服和军旗的荣誉、公然得到准许的暴力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堕落以外，还另有一种堕落，那就是：在经过精选只有家财豪富、门第显贵的军官才能加入的近卫军团里由于富裕和接近皇室而造成的堕落。结果这两种堕落就促使身受其害的人陷入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自从聂赫留朵夫担任军职，开始像他的同事们那样生活以后，他也就落进这种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里去了。

正事是一点也没有的，他光是穿上一身并非由他自己而是由别人做得很漂亮、刷得很干净的军服，头戴一顶军盔，拿着也是由别人造出来、擦亮、交给他的武器，跨上一匹也是由别人养大、训练好、饲养着的骏马，跟着一些同样的人一起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那就是纵马奔驰，挥舞军刀，开枪射击，而且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别的工作是没有的，可是那些品位极高的老年人和青年人，沙皇和他的亲信，不但赞成这种工作，而且为这种工作夸奖他们，感谢他们。这种工作做完以后，他们认为正当而重要的事就是跑到军官俱乐部里或者最昂贵的饭馆里去吃饭，特别是喝酒，挥霍许多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钱，然后就是剧院、舞会、女人。这以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又是挥金如土，又是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起一种特别厉害的腐化作用。因为假如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就不会不在心灵深处为这样的生活感到羞愧。军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夸耀这样的生活，为它感到骄傲，到了战争时期这种情形尤其严重。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他是在对土耳其宣战以后担任军职的。“我们已经准



备在战争中牺牲我们的性命，因此这种逍遥自在的欢乐生活对我们来说不但可以原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才过这样的生活。”

聂赫留朵夫在他一生中的这段时期就是这样。在整个这段时期，他由于摆脱了以前他为自己规定的种种道德约束而欢天喜地，一刻也不停地处在持续不断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里。

三年以后他到姑姑们家里去的时候，正是处在这种状态里。

聂赫留朵夫去探望两个姑妈，是因为她们的庄园位于他赶往前方他的团队驻地必经之路上，另外，姑妈们一再热情相邀，然而，更主要的是想和卡秋莎见面。也许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已经听从他那如今肆无忌惮的兽性的人的唆使，对卡秋莎起了歹心。然而他没有感觉到这种歹心，只不过打算到他往日觉得很好的一个旧地去重游一番，见一见那两个有点可笑而又可爱的、好心肠的、老是让他不知不觉处在热爱和赞赏的气氛中的姑姑，看一看那个妩媚的、给他留下极其愉快的回忆卡秋莎罢了。

他是在三月底基督受难日这个星期五到达的。路上泥泞不堪，下着倾盆大雨，到达姑妈家时他已全身透湿，冻得浑身发僵，但是他仍然朝气蓬勃、精神焕发，就像这段时期他一直感觉的那样。“她还在她们家里吗？”他暗自想道，这时候他的雪橇驶进姑姑家他所熟悉的旧式地主庄园的院子里，那儿堆着从房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四周砌着一道矮砖墙。他料想她听见他的雪橇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外面门廊上来，然而只有两个光脚的女人从边门出来，走到门廊上，裙裾掖在腰里，提着水桶，分明在擦地板。正门的门廊上也没有她，只有听差吉洪一个人走出来，身上系着围裙，大概也在忙于洒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来到前厅，身穿一件绸料连衣裙，戴一顶包发帽。

“太好了，你到底来了！”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着，吻了吻他。“玛丽娅姑妈有点不舒服，她在教堂里站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索菲娅姑姑，”聂赫留朵夫说，吻了吻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手，“请您原谅，我沾湿您的衣裳了。”

“快到你的房间里去，你浑身湿透了。你都长小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端咖啡。”

“马上就来！”走廊里传来了熟悉悦耳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兴奋得连心都揪紧了。“她在这里！”仿佛太阳从乌云里露出脸来。他随着吉洪喜盈盈地去他原先住过的房间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有心向吉洪问一问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不好？生活怎么样？要嫁人吗？然而吉洪的态度那么恭敬，又那么严谨，在聂赫留朵夫洗手的

时候他那么坚定地要亲自拧开悬壶洗手器给他倒水，这就弄得聂赫留朵夫不便于问他卡秋莎的情况，光是问一问他的孙子可好，那匹名叫“老兄”的老马怎么样，那条看家狗波尔坎怎么样。他们都活着，挺好。波尔坎去年得了疯病。

聂赫留朵夫脱下所有的湿衣服，刚刚穿上干净的衣服，就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随后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听得出是谁的脚步声和敲门声。这样走路和敲门的只能是她。

他披上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果然是她，卡秋莎。一切都跟从前一样，只是比以前更加妩媚可爱了。那双含着笑意、天真无邪、微微斜视的黑眼睛依然这样自下往上地望着他。她身上也跟从前一样，仍旧系着干净的白色围裙。她从他姑姑那儿拿来一块刚刚拆掉包皮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俄国式的大浴巾和一条毛茸茸的浴巾。不论是那块没有动用过、刻着字母的香皂也罢，那两条毛巾也罢，她本人也罢，一律都那么干净，新鲜，清白招人喜欢。她那可爱坚毅的红唇依然像以往那样，看到他时因难以克制的喜悦而紧抿着。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欢迎您！”她费劲地说道，脸上泛起了红晕。

“你好……您好！”他不知道该称“你”，还是“您”，因而也像她那样满脸通红。“您好吗？您身体好吗？”

“很好……姑妈让我给您送来您喜爱的香皂，玫瑰香的。”她说，她把香皂放在桌子上，把毛巾搭在圈椅的扶手上。

“侄少爷自己有。”吉洪说，为客人自备用具无须麻烦别人的气派辩护，得意地指一指聂赫留朵夫的很大的化妆用品箱，箱子已经打开，露出许多小小的银瓶盖，箱子里放着大量的玻璃瓶、刷子、发蜡、香水和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品。

“请替我谢谢姑妈。我多么高兴，我又来到这里。”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心里又变得像以往那样开朗、温柔。

她听了这些话，只是微微一笑作为回答，然后就出去了。

姑姑们素来就钟爱聂赫留朵夫，这一回见到他，比往常还要欢喜。德米特里正要动身去打仗，说不定会负伤或者阵亡。这打动了姑姑们的心。

聂赫留朵夫原来安排的旅程只能在姑妈家待一昼夜，可是见到卡秋莎后，他就同意在姑妈家过复活节。他打电报给他原先约定在敖德萨相会的朋友和同事申博克，请他也到姑姑们家里来。

聂赫留朵夫从见到卡秋莎的头一天起，就对她生出了他旧日对她的那种感情。他现在也跟先前那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不能不激动，听见她的脚步



声、说话声、欢笑声就不能不高兴，瞧着她那对像湿润的醋栗那么黑的眼睛，特别是在她微笑的时候，就不能不动心，主要的是他们相遇的时候，她一脸红，他就不能不发窘。他感觉到他在恋爱，不过跟先前不同，先前那种恋爱对他来说是一个秘密，他自己都不敢对自己承认在恋爱，而且相信人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也在恋爱，却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为此高兴，尽管想瞒住自己，却隐约知道这种恋爱是怎么回事，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就跟在一切人身上一样，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已经在他的身上引起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着上风，完全压倒了精神的人。可是他见到卡秋莎以后，重又产生了他以前对她生出的那种感情，精神的人就抬起头来，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于是在复活节前一连两天当中，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一场他自己也不觉得的内心斗争。

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他应当走掉，没有必要再在姑姑们家里住下去，知道这样住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然而，他是那么高兴，那么愉快，结果他没有对自己说这些话，却住下来了。

在基督复活节的前夜，星期六傍晚，一个司祭带着一个助祭和一个诵经士坐着雪橇到这儿来做晨祷，按他们的说法，他们是费尽气力经过水塘和干地才走完从教堂到姑姑家的那三俄里路程的。

聂赫留朵夫同姑姑们和仆人们站在一块儿做完晨祷，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卡秋莎，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按照复活节的规矩同司祭、同姑姑们互相吻过三次以后，正要走去睡觉，却忽然听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老女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在外面过道里准备跟卡秋莎一起动身到教堂去给复活节的甜面包和甜奶渣糕受净化礼。“我也去。”他暗想。

到教堂去的路，不论是坐雪橇还是坐马车，都不好走。因此，在姑姑们家里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的聂赫留朵夫，就吩咐人把那匹供乘骑用的名叫“老兄”的马备好鞍子，他自己不再上床睡觉，却换上漂亮的军服和紧身的马裤，穿上军大衣，翻身上了那匹养得很肥、身体笨重、不住嘶鸣的老公马，摸着黑路穿过水塘和积雪到教堂去。

这次晨祷，在聂赫留朵夫此后的全部生活当中，成为一次最鲜明、最强烈的回忆。

他骑着马，趟着水，走完漆黑的、零星点缀着几堆白雪的道路，进了教堂



的院子。他那匹马一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就竖起了耳朵。这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

有些农民认得他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子，就把他领到一块干燥的地方下马，给他把马拴好，带他走进教堂。教堂里已经满是过节的人了。

右边都是农民：老年人穿着土布长衫和树皮鞋，脚上裹着干净的白色包脚布；青年人穿着粗呢的新长衫，腰上系着颜色鲜艳的宽腰带，脚上穿着高腰皮靴。左边都是农妇，头上扎着红绸巾，上身穿着棉绒的坎肩，配着大红的衣袖，下身穿着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或者杂色的裙子，脚上穿着打了铁掌的半高腰靴子。站在她们后边的，是衣服朴素的老太婆，扎着白头巾，身穿灰色长外衣和旧式的毛织裙子，脚上穿着普通鞋或者新树皮鞋。这两群人中间夹杂着一些衣服考究、头发上抹了油的孩子。农民们在胸前画十字，鞠躬，把头发甩到后面去。女人们，特别是那些老太婆，都用黯淡无光的眼睛盯住一个有许多蜡烛照着的圣像，捏紧她们并拢的手指头，有力地点一下额头上的头巾，再点两个肩膀和肚子；她们嘴里不出声地念叨，弯腰站着，或者跪下。孩子们学大人的样子，一见有人在瞧他们，就起劲地做祷告。那些缠着金色螺旋纹的大蜡烛，以及从四面八方把它们围住的许多小蜡烛，照得金黄的圣像壁像是起了火。枝形大烛架上插满了蜡烛。从唱诗班那边传来业余歌手欢畅的歌声，其中夹杂着粗重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高音。

聂赫留朵夫走到前边去。上等人站在教堂的正中，其中有一个地主带着他的妻子和穿着水兵制服的儿子，有警察分局局长，有电报员，有一个穿着高腰皮靴的商人，有一个佩戴着徽章的村长。读经台右边，在地主太太身后，站着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穿着亮闪闪的淡紫色连衣裙，戴着坠流苏的白色披巾。卡秋莎跟她站在一起，穿一件白色连衣裙，胸前缝着皱褶，系一根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花结。

复活节那天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喜庆、庄严、欢快和美好：牧师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戴着金十字架；执事、助祭和诵经士穿着有金银丝绦装饰的白色法衣；业余歌手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头发擦得油光闪亮；节日赞美诗的欢快调子听上去就像舞曲；牧师们高举着一支饰有花卉的大蜡烛，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一遍又一遍地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那么美丽，但最美丽的还是那穿着雪白连衣裙、系着蓝色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眼睛闪耀着喜悦光芒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感到她虽然没回过头来，却看见他了。这是他在经过她的身边，往祭坛那边走过去的时候看出来的。他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不过他想了